

中国的知识流散¹

——海外中国知识分子间的交流网络

Anthony Welch, Zhang Zhen 著, 刘雅 译²

在比较教育的大部分历史上,民族国家都被当作基本的分析单位。这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在20世纪,当民族国家刚刚形成,或当欧洲一些主要的民族国家在世界各地进行帝国主义竞争的年代)。然而,随着新千年的到来,两个因素交织产生的作用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民族国家作为比较教育基本分析单位的地位,这就是全球化和知识经济。

知识流散与国际知识神经网络 (INKNs)

Benedict Anderson's(1983)曾提出过“想象的群落”(imagined community)的概念,这一概念对于理解流散的群落(diasporic communities)的现实有一定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对于许多留散人来说这样的群落都必然是想象中的,因为流散人群落当中的许多人都是在完全脱离祖国的情况下长大的,他们对祖国的了解来自从长辈那儿继承而来的,褪了色的或者是僵化了的概念。这种对昔日故土的碎片化的理解,使得这些流散人呈现出(文化上的)杂交特点,成为(不同文化的)夹心人。

尽管在理解教育的差异时,对民族国家这一分析单元的重视并没有减退,但是当代的比较教育研究已开始考虑到全球移民,尤其是那些高技术水平的人的移民的影响。近年来研究中对高级人才迁徙的充分关注,进一步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变化。全球范围内,包括那些流散共同体内部的知识流动,对我们传统的空间和地域理念提出了挑战(Tsolidis 2001)。

人才外流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起源于文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有关差异。“人才外流是发达国家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人员吸引过来而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进一步枯竭,这就加剧了发展的鸿沟”(OECD 2004b:89, World Bank 2003)。现在南北之间在科学方面的差距是巨大的,并且由于上述的原因这种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以下一些数据可以反映这个问题:北半球人均拥有的从事研究与发展的人员(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是南半球的10倍,并且花费GDP的比例是南方的将近4倍。除此之外,欧美以及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审批的专利有97%,发表的科学论文有84%是北方的(World Bank 2000:69)。除此以外,即使在中心(国家)当中,也可以区分出中心和边缘。例如,美国的科技研发占整个工业社会在这方面投资的近一半,相当于其他7个顶级国家的总和(NSF, 1998)。

这表明,北方对南方的技术人员尤其是学术界人士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对这种吸引力达到了什么程度(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领域)进行测量的手段正在得到改进。但传统的研究都低估了这种程度,因为传统研究主要是基于供应指数(stock data),即在某个点上流入某一国的技术人员的数量,或者是流动指数(flows data),即已经进入某一国的技术移民。然而,国家科学基金会主持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和法国工作的国外出生的科学家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国获得的博士学位(NSF 1998: 3-19)。此外,只有一半的国际博士生或攻读博士后的人在(完成学业后)两年内回到他们的祖国。事实上,那些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在美国学习者,返回的比例低至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二。在20世纪90年代末,在中国获博士学位的人大约有一半到美国寻求并获得了继续深造或工作的机会。(Johnson & Regets, 1998)。由NSF于2001年

¹ 流散(diaspora),原意是指犹太人大规模从他们自己的国家移居到别的国家生活和工作。在本文中,作者用来指大规模的高技术人才的外流及其带来的知识流动。(译者注)

²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译者在尽量忠实原意的前提下对原文有所删节。(译者注)

公布的一个报告表明,对于流散的知识分子而言,美国是一块最大的磁石,它在科学和工程领域尤为倚仗国外学者的贡献。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里是一支最大且增长最快的队伍,且都集中在研究生阶段并且是在科学和工程领域。其次,在美国的中国大陆学生数比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中国台湾和印度加起来的学生数还多。再次,中国目前的经济腾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人才外流的局面。为了国内的发展,中国政府已经利用机会吸引中国在外学者回国(Dahlman & Aubert, 2001; Saxenian, 2003; Zweig & Fung, 2004)。1992年,中央政府对留学生颁布了“支持出国,鼓励回国,保证来去自由”的政策。另外,由教育部主持的“春晖”计划,由李嘉诚和教育部合力资助的“长江学者计划”等都已经开始实施并发挥作用。不过,虽然有这些努力,中国公民尤其是年轻的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外流的情况仍然持续增加。在1978年到2002年间,约有580,000学生和学者在国外学习和接受培训,而只有160,000回国(Zweig & Fung, 2004)。事实上,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国内一流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便开始大量流向国外。例如,北京大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系毕业的学生有40%自费出国留学(Zhang & Li, 2001)。而中国最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年轻而出色的研究人员外流的情况也十分显著。一个潜在的事实就是中国至少是暂时地流失了“最好的、最聪明”(人才)给发达国家。尽管回国率在增高,而且中国高教剧烈扩招,但这个群体过大的流出量也会超过高科技人才产生的量。从长远来讲,这样持续的人才外流将会减慢中国发展的速度,因为人力资源被看作是知识经济发展的中心发动机。

全球化的新时期, 流散的新形势

以上数据已经表明,出国留学被当作了一种移民的渠道,越来越多的留学生走这样的道路,从而使技术移民的规模升级。然而,这些数据也同样低估了这种现象的程度以及它对南部国家,即绝大部分技术劳力的流出地造成的冲击。南部国家那些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可能在本国没有工作,或是渴望更好的、更有成就的生活,或缺乏他们在北部国家所能拥有的权利和自由,通常会向往一片更绿的牧场。以上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在今天这个全球移民涌动的时代,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开发出旨在选拔技术人员的项目(而与此同时,对其他类型的移民例如政治避难者设置了越来越严苛的障碍)。例如,德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专门制定了旨在吸引高层次技术移民的政策。实际上目前澳大利亚申请永久居住权最大的群体(通向公民资格的第一步)由国际学生组成,他们通过加分而获得澳大利亚的居留权。

然而,这样的人才流动越来越不全是给流出国带来损失(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菲律宾和墨西哥,由于人才流散伴随而生的汇款,目前已经超过了官方的海外发展援助金额(Overseas development aid),从而抵消掉一部分用于培养那些出国了的高级技术人才的公共投资的损失。据世界银行估计,全世界正式汇款的总额在2001年达到723亿美元,但是非正式的来源会使这个数目大大增加)。目前的趋势表现为暂时移民(temporary migration),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包括科技研发领域在内的高水平人才开始回流。许多人带回了国内需要的技术、知识、关系网,这对他们祖国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在中国知识分子流散数目和比例的变化上,这一点在表现得非常明显。近些年由于中国经济的腾飞、开放程度的增加,回国率有显著提高。(不过正如上文所示,人才外流的现象仍在持续)。在以色列的俄罗斯犹太人流散也表现出相似的情况,推和拉的效应都在起作用。

不过这里必须作进一步的说明。首先,那些选择回国的人并不总是能够适应。有证据表明在东亚的大多数国家(地区),在儒家文化主导的社会里,普遍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等级制观念、论资排辈和嫉妒的现象,不大接受那些持有国外学历回国的人的新观点(Welch 2004, Yang 2002)。其次,那些继续留在国外的人,不仅是实在的,而且也越来越多地通过虚拟的方式和国内经常保持联系。UNCTAD最近对1500名在美国硅谷工作的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知识

分子的调查显示,他们中百分之五十的人一年回一次国,百分之五的人一年至少回国五次。此外,被调查的中国人中有百分之五十(印度人的比例还要高得多)打算回国创业。

其实那些选择留在国外的人通常会愿意、也能够通过越来越多地运用复杂的知识神经网络对国内的研究和发展作贡献。他们每天都可以通过电子方式提交论文、提出建议和与同行建立联系。他们可以与持有相同语言和相同研究兴趣的同行共同撰写论文和研究课题,这样,身在国外的他们可以贡献许多研究所需的技能:不论是理论上的、经验上的,还是语言/文化上的。在这一意义上,对于流出国来说,知识分子流散与其说是一种负担不如说是一种资源(Brown 1997, 2000; Lowell 2001, Meyer and Brown 1999)。因此,人才流出国建立激励机制鼓励留学人员回国作贡献,应该仅仅只是应对人才外流问题的一个方面。

需要再一次指出的是,全球化造成的差距也是显而易见的。全国科学基金会(NSF)最近一篇关于网络基础设施(cyber infrastructure)的文章强调这一现象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并指出那些不能迅速调整并对之加以利用的国家将会落后。作者认为,网络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距离、时间和学科界限的限制。计算和视觉等各方面的新方法不仅仅是在国内的研究者之间被分享,事实上,在虚拟的研究共同体变得越加重要的全球交流的时代,网络本身就是国际性的:“现在社会学、生物学和物理学方面关键数据的搜集都可以在线远距离实现”(NSF 2002:1)。对比较教育学者来说同样如此,远距离获取具体而准确的数据以及当代政策和实践信息的能力,是当代研究至关重要的因素。

这种潜力巨大的国内和国际的“合作”越来越受到人们认可,这一点在科学和工程领域或许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有必要再一次强调进行这样的合作当中的不平等——开发超级计算、数据储存能力和相关的技术设备的费用据NSF估计不少于99亿美元每年,而这个数字只有美国,也许还有英国有实力考虑。尽管存在这样的差距,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开发复杂的国际知识神经网络的潜力仍然是巨大的,而且有可能缩短空间距离、提高质量以及节省提出研究方案的时间。

澳大利亚的中国知识分子流散

全球知识网络的阶层化实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知识分子仍在大量地从南向北流动。正如Solimano(2002)所说的那样,由于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吸引研究人才,这样,以牺牲发展中国家为代价,发达国家原本发达的知识基础变得更加牢固,因此知识创造和应用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得以恶化。由于知识和技能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中心和边缘国家之间这种结构上的不平等使得不同社会通过知识网络进行平等交流变得不太可能。而全球知识网络越来越多元化的特点意味着知识分子流散可以在缩小南北科学差距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Brown, 2000; Meyer, 2001; Zweig & Fung, 2004)。知识的转移对于那些旨在加强知识密集和不太密集的地方之间联系的知识分子散居政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比方说Choi(1995)就发现许多美国高等教育中亚洲背景的学者和他们祖国的同行和机构保持学术上密切的联系。

这一发现是否适用于其他知识分子流散?散居在外的知识分子究竟怎样与祖国、与其他的散居知识分子群体保持联系?下面的研究是关注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流散群落的,它研究的背景是澳大利亚这个相对比较发达、吸引了大量知识分子、学者和学生,但同时自身也面临人才外流问题的国家。这项研究是在澳大利亚一所建立于19世纪、精英“八校联盟”(elite “Group of Eight”)之一的大型研究型大学里做的。一个世纪以来,这所大学在澳大利亚的教学和科研方面发挥了重要的领先作用。为了学校的发展,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被当作一项重要的策略。这所学校长久以来和中国合作,目前拥有许多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学者。我们用校园网对大学的中国大陆学者编了一个临时性的表。研究采用有目的的抽样,因为我们假设这样的被调查者在与其他的中国移居国外者和中国大陆人员的关系网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研究对象由六人组成,通过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我们试图揭示和分析他们个人对于和祖国国

内、以及海外的中国学者合作的看法。

从总体上来说,被调查者表示有兴趣与中国学者,尤其是大陆的学者保持联系。本研究中所所有的六位被调查者都与祖国大陆的同行建立了学术上的联系。中国学术研究的质量,勤奋踏实的研究习惯以及谦恭都受到被访谈者的欣赏,另外还有与其他中国人打交道的相对轻松和熟悉。显然,共同的文化和语言背景使这种学术共同体变得更加密切。这种与祖国合作的许诺和意愿支持了最近的另一项研究(Meyer et al, 2001)。学者们运用“阴-阳”的范式,表示在他们这些移居国外的知识分子的中心中可以识别出边缘来,由于他们现在能够利用新的通讯技术,来自中心的资源可以被边缘的加以利用。因此,中心和边缘的鸿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缓和,因为前者的长处对后者有帮助。和先前有关亚洲知识分子流散问题的研究(Choi 1995)显著不同的是,没有一个被访者与台湾、香港或新加坡的同行保持联系。有趣的是,尽管被调查者与祖国联系,但他们中有四人表明他们与大陆的学者没有任何具体的合作项目,或至少是在与大陆学者的专业联系方面没有任何合作性的成果。他们谈到了影响这种学术交流的许多因素。

影响学术合作的因素

他们认为学术地位、性别、共同的研究兴趣和领导的形式等因素,都会对合作的质量造成影响。首先是学术地位的影响。有两位女性被访者提到,在她们开始形成合作关系之前先建立自己的事业十分重要。她们认为,合作的机会和范围都取决于专业职称,而她们晋升的机会则取决于他们个人的研究能力。其次是研究兴趣。有三位被访者都认为他们的研究领域在国内缺乏发展是限制他们与国内合作的一个因素。最后是领导方面的影响。领导方面的因素对中国的海外学者和国内的学术合作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消极的。有三位被调查者在回忆他们在与大陆代表团接触的经历时指出,访问之后往往就没有后续的行动了,结果是,他们至今仍不清楚究竟应该如何与国内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被调查者们认为,关于他们与中国学者尤其是大陆学者的交流情况最好的形容就是,在积极和消极的两个极端之间徘徊的连续体。尽管他们有兴趣与中国学者合作,但学术地位和研究兴趣是两个决定性的因素,有共同兴趣的学者间的交流是自然的。在与国内的机构和个人联系方面,领导方面的支持和大陆同行的认可也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发现支持早先Choi (1995)的研究结论。她认为高级学术人员有更多的机会发展专业合作关系,因为他们的地位更稳固,这就确保了他们能更容易获得和利用资源。此外,她发现发展中国家因为经济基础较薄弱而无法利用西方知识,这使他们难以吸引高度专业化的合作。在此意义上,发达的本土科学共同体的综合性是整合与利用其海外学者专业性的必要前提(Meyer & Brown, 1999)。根据Choi (1995)的观点,中国科学共同体缺乏专业性是中国学术界被边缘化的标志。这一观点在下文中会得到进一步阐释。

中国领导的质量则是使被调查者与大陆建立合作关系变得复杂的重要原因。关键是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领导要对学科发展的前沿有更好的了解。否则,要物色和吸引高层次人才就很难。领导如果不改进的话,即使有大量的资金投入,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学也是不现实的。对高科技人才的重视不能只是虚夸的、没有实际意义的空口号。对大多数中国代表团来说,主要的目标,至少是提上日程的,是如何促进双方的理解,为将来合作建立联系。这里的问题是,访问结束时并不意味着代表团的使命就此结束。

边缘化

边缘化这一概念表明了(被调查者们)对于中国对国际知识网络的成果缺乏接触,贡献也很有限,特别是大陆学者在科技方面与同行们的交流合作非常有限的这样一种情况的认识。它还反映了一种在更广的意义上,(被调查者们)对于中国学术界在获取资源、学术氛围和学术传统方面水平较低的一种感觉。

尽管有一些分歧,但被调查者们基本上都认为中国在国际知识网络中的参与是有限的。

他们指出，最有影响力的期刊总体上都是来自北方，特别是美国。他们还指出，大陆学者在他们的研究领域中那些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中仍然不那么杰出。许多（但不是所有的）大陆学者的论文不能发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质量不够好。有两位被访者认为大陆研究者对自己研究领域的最新信息缺乏了解是影响被访者与他们合作的质量受到影响的重要原因。此外，还有两位被访者认为语言是限制大陆研究者发表论文的又一重要因素。正如研究者所料，大多数被访者都认为目前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氛围对中国学者的科研造成了负面影响。两位被访者认为质和量的关系上存在问题。他们认为大陆学者倾向于发表更多的论文，却不是更好的论文。有三位被访者提到，中国学术界倾向于强调应用性的研究，而在基础性的研究上花费的力气则较小。当然，这在今天的中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更多机会赚钱和立业的机会。另外，两位被调查者还提到，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学术传统的影响，并且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也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大陆学者总是以一种简单的、不那么精密的方式做研究的原因。不过，所有的被调查者都认为中国做研究的方式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的归来会有所改变。

阶层化

本研究发现，研究资源的缺乏对大陆学者在学术研究上影响力有限有一定的影响，这一发现证实了先前研究的成果。而关于世界经济对国际知识网络的影响的研究揭示了两之间直接的因果关系(Altbach, 1985, 1987, 1995, 2002, 2004; et al)。

在中国也是这样。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的十五年间发展很快，但这种发展的成果分配很不均衡，因此经济上的分割仍陷于落后的泥沼之中，伴随着低文化率和相当的贫困。高等教育的发展成果和投资，也在全国范围内分配得极不均衡。所以，尽管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将会在国际知识网络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他们将几乎是无一例外地来自中国最卓越的机构，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大多数中国学者边缘化的地位仍将持续。

我们所做的访谈反映出被调查的人们对中国高等教育阶层化程度的深刻认识，并且表达了他们对其影响相当一致的看法。有两位被访者对中国大学的学术活动表示了高度的欣赏。此外，有两位被调查者特别提到了中国高等教育不同学科间不平衡发展的影响。其中一位被访者认为这对他在自己的领域与大陆同行建立专业上的联系构成了限制。

中国高等教育系统阶层化的结构已经随着中央政府实行选择性的政策（例如著名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得到强化，为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政府将急需的资源倾注向重点大学，而以牺牲差一些的学校为代价。作为这工程的一部分，能吸引到有国际教育背景的教授是个重要的指标。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仍然落后的情况下，有些以研究为取向的高等教育机构能够拥有最好的设施和海外教育背景的学术人员，以最高的国际水平运作的原因。

这一现象高度反映了中心和边缘现象在全球范围和国家内部都存在的事实，同时也反映了经济因素以及中国的国家发展重心。Altbach (2004)曾指出，象中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一些大学正在接近世界一流研究机构的水平，尽管世界顶级的地位仍然被北方一些领先的研究型大学占据。事实上，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背景下，高等教育的结构正在变得多元化。即使在中心范围内，也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分，例如，美国所谓的“常春藤盟校”、英国的“罗素大学集团”（Russell Group）和澳大利亚的精英“八校联盟”都属于中心的“中心”。

结论

关于语言的熟练性问题、引文检索体系的偏向性问题和中西方研究方式的不同等因素对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科学共同体的不同地位的影响的研究发现支持了先前关于第三世界学术的研究(Altbach, 2002, 2004, Welch 2005)。研究发现表明，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刊物，绝大多数在北方编辑，仍保持了学术研究效度的要素，而因为普遍缺乏语言的熟练和对西方研究系

统的熟悉，发展中国家的学术发展仍处于明显的不利处境(Altbach 2004, pp. 7-11)。

关于中国海外知识分子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性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的研究再一次支持了对流散知识分子选择的主流研究，这些研究提出了“选择”(option)这一概念，认为那些高技术人才的大量外流是一种实质上的，如果有时是暂时的损失，但同时对流出国来说也可以是一个潜在的可资利用的资源(Brown, 2000; Lowell, 2001; Meyer et al, 1997; Meyer & Brown, 1999; Meyer et al, 2001; Teferra, 2004; Wickramasekara, 2002; Zweig & Fung, 2004)。从世界范围内的相互联系性日益加深的角度来看更是这样，特别是在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日益浓重的时代，学术研究界尤为如此。

流散的概念，刻画了海外知识分子的那种中间状态 (in-betweenness)，对教育以民族国家为理所当然的分析单位提出了挑战。知识流散的发展，或者说国际知识神经网络，将进一步促使我们重新考虑民族国家这种分析单位。教育研究在不同的前提下采用了不同的研究维度。与此同时，它们还预示了在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进行研究的新方法，以及为祖国的研究和发展作贡献的方式，流散知识分子群落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作者简介：

Anthony Welch,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教育社会学、政策研究、比较教育、高等教育、国际教育等领域的专家。

Zhang Zhen,

译者简介：

刘雅，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04级硕士生。